

# 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方案和经验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中国共产党坚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突破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而难以突破“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探索形成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方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在如何促进全面协调发展上,基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发展观,构建政策目标体系;在如何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上,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促进农业农村组织化,完善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在如何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上,探索形成产业链、价值链、产权联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多维途径;在如何实现工农城乡协同发展上,探索实行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支持的政策;在如何布局工作上,以重中之重的布局,在把握发展趋势和规律基础上主动施策。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短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同富裕;农村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20)05-0005-07

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乡村人口数量庞大,还能够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上实现历史性突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突破了单纯从某一个体或局部资源配置效率出发而难以突破“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路径锁定,探索形成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方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一、基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发展观构建政策目标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下的“三农”短板是相对的。新中国自成立起,“三农”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仅以全国粮食产量为例,2019年达66384万吨,比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长了4.87倍。尽管如此,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受发展能力上的农业弱于工业、农村弱于城镇等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存在城乡差别。中国城乡发展的差距,仅以收入为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尽管实现大幅

增长,由1949年的43.8元增加至2019年的16021元,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却较大,其中最高为2007年的3.14:1<sup>[1]</sup>。这种城乡发展不平衡,不是只在中国发生,而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是难以破解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下全面小康社会的“三农”短板问题,不是任其发展,不允许农民被平均化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是更重要、更难做到的“全面”<sup>[2]</sup>。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城乡之间被平均化,那会有几亿农民被平均化。农民如果被平均化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实际上是没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程中,着力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这一重大结构性问题。

2013年,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sup>[3]</sup>。这一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

**作者简介:** 郑有贵,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三农”问题。

把握和生动论述,深化了促进“三农”发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要地位的认识。2017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深思乡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习近平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百分之六十,但作为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十三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村人口还会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即使城镇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也还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城市不可能漫无边际蔓延,城市人口也不可能毫无限制增长。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确实很华丽、很繁荣,但很多农村地区跟欧洲、日本、美国等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sup>[4]</sup>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sup>[5]</sup>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世界性问题的勇气和使命担当,展示了着力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和政策体系,厘清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抓的重点、要补的短板、要强的弱项的工作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视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三农”短板难题,牢固树立“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发展观,从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乡村人口数量又很庞大的国情出发,以农民是否小康为目标导向,构建完善“三农”的政策体系,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三农”事业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由最高的2007年的3.14:1,缩小为2012年的2.88:1,再缩小为2019年的2.64:1,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同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脱贫问题解决,现行标准下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为2019年的0.6%<sup>[6]</sup>,创造了人类减贫事业的奇迹。

## 二、在共享发展理念下完善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小康是全面的,不仅仅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之所以能够促进农村全面发展,是因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索形成能够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组织化发展路径。

中国顺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要求,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组织化,解决了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在使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阶段,农民一家一户生产中存在耕畜、农具、资金等生产要素不足的问题,有的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这些困难,中国在历史上就有换工、打会以及相互调剂耕畜、农具使用等互助合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而实行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后,由于仍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农业阶段,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发展生产中仍存在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就是为了解决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生产要素短缺的问题。同时,中国为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也需要通过农业生产组织来促进农业发展,以保障能够顺利地让农业向工业提供所需农产品原料和资金支持。为解决大规模跨社开展农田水利特别是水库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始探索规模更大一些的小社并大社乃至人民公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机械、电力、化肥、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运用,生产力水平远高于20世纪50年代。家庭承包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发生较大变化,基本不存在农具、耕畜短缺问题,而是在从事商品生产过程中遇到了新问题,主要包括分散经营且规模极小的农户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以及竞争力弱,在交易中处于弱势,需要通过组织起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了不经济的高新技术引进、生产资料采购、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加工销售等问题。这些成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再组织化的动力和互助合作的内容。

中国在农业农村组织化上,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比,有相同之处,即面对农户或家庭农场分散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都是通过组织化以节约交易成本、实

现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等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时,也有所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中国在农业农村组织化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从实际出发,致力于探索形成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共享发展成果有机统一的农业农村组织化形式。中国的互助合作组织形式是由走共同富裕道路决定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政治上解放农民,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还领导农民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这贯穿于1949年以来的整个历程。其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三农”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中强调,中国的小康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及其分配原则,他说:“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sup>[7]</sup>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在陕西省考察时指出,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sup>[8]</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完善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共享发展成果有机统一的农业农村组织化形式,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方式进行完善,有公司把农民加进去的“公司+合作社+农户”,有农民牵头的自组织“合作社+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并在多种经营主体“+”中,通过土地经营权等入股方式实现股权联结,将单纯交易式联结的“+”,改进为经营主体一体化联结的“+”,促进包括农民在内的一体化产业组织的发展。探索形成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共享发展成果有机统一的农业农村组织化形式,既有利于促进农户分散经营困难的解决而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发展

社区集体经济,以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方式,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能力总体上还不强,但这一机制的构建,在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通过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为农村全面发展提供资金支撑。中国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业社会,探索出凑份立公田、打会等抱团互助方式<sup>[9]</sup>。这一农村统筹积累方式,对于有限解决生产力水平低下阶段农民生产生活困难、传统乡村秩序的维持乃至小农支撑国家大一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传统乡村凑份抱团互助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根据工业化初期需要农业向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探索出通过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并通过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实现积累,以解决“三农”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中国从走共同富裕道路出发,建立起能够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兼具提供公共品,以及有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由此所构建起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传承了传统乡村凑份抱团互助文化,去除了宗法伦理主导及服务于封建社会统治之糟粕,形成具有较强内生发展能力而能够破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强依赖难题的中国式路径<sup>[10]</sup>,促进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

第二,通过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国家财政支持资金能够更好发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作用。一方面,弥补国家支持“三农”发展财政资金不足的缺口。进入21世纪,中国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明确国家财政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等建设投入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下发展“三农”事业所需资金量较大,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三农”的发展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包括发展集体经济、以“一事一议”等方式筹资筹劳,保障乡村建设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通过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统筹乡村发展,引导资源配置,加之通过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和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股权联结,致力于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机制,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卫

生、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和美丽乡村建设,进而把国家财政资金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作用更为充分地发挥起来。

从上述中国农业农村组织化的历史演进和在促进农村全面发展上发挥积极作用可见,一方面,尽管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下农业农村组织化中所解决的问题及实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组织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基于某种理论或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当时历史场境和无视历史发展逻辑,不区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农业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对组织化的需求、合作内容及组织化促进发展的作用,会把对新中国农业农村组织化实现形式的实践探索的评判引入误区<sup>[11]</sup>,也不利于从中吸取历史智慧,并从实际出发对农业农村组织化形式加以完善。

### 三、基于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国情,多维拓展“三农”发展空间

面对工业化快速发展与农村发展滞后甚至凋零的二元结构,发展经济学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探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拉尼斯和费景汉修正后的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的新二元经济模型以及H.钱纳里和M.塞尔昆的结构转换理论,提出了增加农业剩余、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小城镇、保障工业化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性等思路。

中国基于人多地少的现实,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出发,探索形成多维扩展“三农”发展空间的路径。主要有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辐射带动“三农”发展;通过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进城就业创业,使一部分农民就业非农化和转变为市民;通过提升农民素质、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三农”发展能力的增强和全面发展;等等。其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

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产权联结,拓展“三农”发展空间和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产业链低端和价值链低端的初级农产品生产与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高端的二三产业发展分离,这是“三农”发展难以摆脱受弱质性困扰的原因所在。中国拓展“三农”发展空间,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联结和工农关系的构建上进行创新,突破了

“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锁定。中国在致力于工农业相互促进中,经历了由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中国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把工业限于城市和工矿区,尽管如此,也允许农村发展手工业和社队工业。1958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这样一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设想,最初是出于人民公社便于领导<sup>[12]</sup>,在实际上是有利于促进产业链的联结及在此基础上拓展“三农”发展空间。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sup>[13]</sup>改革开放前,这一构想没有很好的实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把在农村发展工业限于国家计划经济外的拾遗补缺的“五小工业”范围,尽管如此,种下了社队工业的种子。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探索试行农工商综合经营<sup>[14]</sup>,尊重农民的实践创造,走出农村工业化之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验证了毛泽东关于“光明灿烂的希望”的远见。1990年代,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基层创造了把产业链中的产加销、贸工农联结起来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对接,进而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由于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初期仅实行“公司+农户”模式,其中的两个利益主体在交易谈判能力上存在明显的强弱差异,相对弱勢的农民难以充分分享到发展成果。总体而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增强了“三农”的发展能力,也拓展了“三农”的发展空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关联度提升,向融合发展演进。十八大以来,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致力于将各利益主体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更紧密地联结起来,由此农民可以更充分地分享发展成果,进而能够破解产业链和价值链高低端分离下“三农”发展难以摆脱受弱质性困扰的难题。

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拓展“三农”发展空间。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就了我国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乃

至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另一方面也约定了“三农”发展空间<sup>[15]</sup>。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启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之际,尽管为保障城市工业快速发展而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分割城乡发展,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sup>[16]</sup>考虑,提出在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工业和小城市,让农民就地发展工业,以避免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sup>[17]</sup>。在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并进格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结构性问题,提出逐步解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sup>[18]</sup>,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sup>[19]</sup>。进入新时代,中国致力于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而发生农村边缘化的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sup>[20]</sup>。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在城乡一体化实践基础上,在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使用城乡融合发展概念,明确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路径。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sup>[21]</sup><sup>[42]</sup>。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列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sup>[21]</sup><sup>[60]</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重塑城乡关系,形成了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破解全面小康社会“三农”短板难题的新路径。

#### 四、探索实施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支持的政策

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政策选择,一开始就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而是与工业化发展联系在

一起的,其中一个核心政策是农业与工业的剩余在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既要追赶工业化进程,又要解决由于农业与工业在生产率、投入回报率等方面的差异,“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问题。新中国自成立起,根据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以缩小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差距并实现协同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为长远目标,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养育工业,进入工业化中期则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后发弱势窘境和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等多重因素限定下,要追赶工业化进程,全国人民不得不勒紧腰带艰苦奋斗,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这当中,既包括对城镇职工实行低工资、对城乡居民实行低消费政策,还包括实行一定程度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是基于全局发展利益、长远发展利益的一种选择,在实践中也注重保障局部发展利益和当期发展利益。这样一种统筹发展政策,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对“大仁政”、“小仁政”进行了辩证透彻的阐释<sup>[22]</sup><sup>[163-164]</sup>。1949年以来中国“三农”发展的实践,对从长远考虑先从农业剩余中取一点支持工业、工业发展起来带动农业发展的“大仁政”,以及相对的只顾农民眼前利益的“小仁政”论断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半个多世纪后,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作出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两个趋向”<sup>[19]</sup><sup>[247]</sup>的论断,揭示了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而支持工业、在工业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后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普遍趋势。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做到在工业化初期实施农业养育工业和进入工业化中期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根本在于发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全国一盘棋,把全局发展与局部发展、长远发展与当期发展统一起来。实践表明,一方面,中国如果在实施工业化战略时不实行从农业的剩余那里取点以支持工业发展、工业发展起来带动农业发展的政策,就很难破解后发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经过较短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末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工业化不能快速推进,也就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乡村人口数量庞大下就难以实施工业反哺农

业政策。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发展趋势和遵从发展规律,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基于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行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支持的政策。中国在启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之前的一段时间,学界以发达国家占多数的城市人口养占少数的乡村人口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为参照,提出了影响很广的在中国当时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不能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主张。这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实行农业养育工业与工业反哺农业上,尽管在产业部门剩余分配上的趋向和实现产业协同发展一致,但不是基于多数人养少数人而作出政策选择和调整,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政策选择和调整,因而能够将全局发展利益与局部发展利益、长远发展利益与当期发展利益统一起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在促进“三农”转型发展,进而促进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切实体现。

### 五、中国共产党勇挑解决好“三农”问题重任和以重中之重的战略布局主动施策

中国共产党勇挑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难题的重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行动上高度自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及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sup>[5]</sup>的深刻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初期,毛泽东于1957年1月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sup>[23]</sup><sup>[200]</sup>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之首,并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仅第七、第八两届中共中央全会就有6次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形成文件<sup>[24]</sup>。进入工业化中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sup>[25]</sup><sup>[670]</sup>

进入新时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化“三农”工作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sup>[3]</sup>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sup>[21]</sup><sup>[22]</sup>。习近平指出,从“三农”工作本身看,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三农”工作<sup>[4]</sup><sup>[8]</sup>。

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形成了以重中之重的战略布局主动施策的制度化机制。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强调要加强党对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这一条例的制定,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问题提供了强有力保障。这种在把握发展趋势和规律基础上主动施策,不仅能抓住发展机遇,还满足了诉求表达能力弱的农民的政策需求,是受弱质性困扰的“三农”能够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进而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

### 参考文献:

- [1] 辉煌70年编写组. 辉煌70年: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5]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 2018-09-27(1).

- [6]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 2020-02-29(5).
- [7]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64.
- [8]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0-04-24(1).
- [9]郑有贵. 从《寻乌调查》探析传统乡村凑份互助文化[J], 党的文献, 2018(3).
- [10]郑有贵. 构建内生发展能力强的农村社区集体行动理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2).
- [11]郑有贵. 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能偏废: 从“废除人民公社”说起[J]. 北京党史, 2016(6).
- [12]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N]. 人民日报, 1958-08-13(1).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8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14]叶剑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79-09-30(1).
- [15]郑有贵. 工业化视角的城乡二元结构评价探讨[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6).
-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清样本[M].
- [17]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 毛泽东与中国农业: 专家学者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 [18]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9]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3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23]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4]郑有贵. 10次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农业决议与当代中国“三农”政策演变[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5).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The Plan and Experience of Rural Areas Moving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in Step with the Whole Country

Zheng Yougu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mly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and breaks the path-dependence and lock-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that is the difficulty to break through the weak nature of “Three Rural Issues” simply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or loc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rms a Chinese approach to promote rural areas towards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During this process we have accumulated valuable Chinese experiences, which mainly include in terms of how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build a policy target system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when defin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key is to observe the condition of rural people”; in terms of how to promote the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co-ordin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communiti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hare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how to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to explore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such a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industrial chain, value chain and the link of property right,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tc.; in terms of how to achie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mutual suppor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owns and villages, which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how to lay out the work, to put the work of “Three Rural Issues” i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 and to take measures actively based on scientifically grasping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weaknesses of “Three Rural Issues”; the strengths of socialist system; common prosperity; the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责任编辑 白洁)